

《诗经》：中国诗歌地理源头及其 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夏汉宁¹

【摘要】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除了其悠久的历史、丰厚的内涵，更有那地域辽阔的十五国风各显异彩，各具特色，因此，《诗经》在给后人带来无穷审美享受的同时，又开启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源头，这就是诗歌地理源头。因此，阐述《诗经》开启中国诗歌地理源头及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 诗经 诗歌地理 源头 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 (2021) 12-0075-09

中国诗歌自诞生之日始，就烙上了鲜明的地域印记。众所周知，中国有一部开创古代诗歌创作源头的诗集——《诗经》，这部诗集就与地域有着密切关联，尤其是十五国风，更鲜明地涂抹上了当时十五个诸侯国的“地方”色彩，可以说，十五国风与地域有着“血肉难分”的关系，这也使《诗经》的地域性特征得以凸显。从地理的角度观察，《诗经》应该是中国诗歌地理的源头。

一

有学者将十五国风（也就是将这十五个不同地域的乐歌），分成了五大诗歌区域：

一是南区（《周南》《召南》《陈风》）。其中，二南主要在南阳（今河南西南部、湖北北部）和南郡（今湖北江陵）一带（二南后来被楚国所吞并，所以有学者一般认为《周南》《召南》当为《楚辞》之源），其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多为女性劳动、恋爱和思夫等，也有部分作品是描写礼俗的，如庆祝新婚、恭贺多子等。陈地主要在今河南淮阳、柘城和安徽亳县一带，其作品多半与恋爱婚姻相关。

二是西区（《秦风》《邠风》）。秦原居甘肃天水，后来逐渐东扩，并占据陕西一带，平王东迁之后，西周王畿和邠地均归秦。邠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秦风》中的作品以尚武精神和杀伐之音为多。宋朱熹在《诗集传》卷6中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邠风》则主要表现的是邠地农家生活，反映农夫辛勤劳作的情景，其作品《七月》，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田园诗。

三是北区（《魏风》《唐风》）。魏的地域范围在今山西芮城一带，唐的地域范围在今山西中部，后称晋。宋代朱熹在《诗集传》卷5中云：“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对于唐风，朱熹在《诗集传》卷6中是这样评说的：“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

四是中区（《邶风》《鄘风》《郑风》《卫风》《王风》《桼风》《曹风》）。邶和鄘皆为卫邑名，故同属一地；郑的都城在新郑，其地域范围主要在今河南郑州一带；卫的地域范围在今河北磁县、濮阳，河南安阳、淇县、汲县、开封、中牟等地；王即为王都

作者简介：夏汉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江西南昌 330077）

的简称，平王东迁至洛邑，即今河南洛阳一带；桧的故都在今河南密县与新郑之间，其范围大致包括今密县、新郑、荥阳一带；曹建都陶丘，即今山东定陶西北其地域范围在今山东菏泽一带。关于这些地方的诗歌所表现的内容，前代学者多有论述。

五是东区（《齐风》）。齐的范围主要在今山东中北部，建都于临淄。司马迁在《史记》卷 129 是这样描述的：“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故《齐风》善于夸饰，宽缓阔达，节奏疏宕。

十五国风这种地域特色的形成，当与那个时代的采诗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子就曾指出：“《邦（国）风》，其内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1]此后文献对此也多有记载：“周公制礼作乐，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所以通情相风切也。”^[1]“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2]“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3]而这种采诗制度对后世仍有影响，如秦、汉时期就延续了这种采诗制度，并在朝廷设立了专门的官署——乐府。后人把这些经过搜集整理的诗歌称作“乐府诗”。“乐府诗”也是继《诗经》《楚辞》之后而兴起的一种新诗体。由于“乐府诗”有不少作品是采集于民间的歌谣，因此，在诗歌文本上，这些作品都与《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一样，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正如班固所言：“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2]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诗经》十五国风的地域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乐府诗”。

在中国古代，还有一部与《诗经》并称的诗集，这就是《楚辞》。这部诗集同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诗经》十五国风中，人们竟然寻找不到“楚风”的“身影”，这不能不让许多人感到疑惑。为此，历代学者对这个疑问都做了探索，并表达了各自的观点，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当属《周南》《召南》即为南方之作（这“南方”自然包含了楚地）。毛亨在解读《周南·汉广》时是这样说的：“《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3]朱熹在解释“二南”时也曾说：“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沔、汝、汉之间，莫不从化，盖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4]毛亨与朱熹二人均认为“二南”所收作品，大多产生于南国，而且其中部分篇章也带有“楚味”，这似乎也可看成是楚歌之代表，但绝对不能以楚风名之。

即便如此，“二南”的风格及特征，都对后来《楚辞》的出现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当是毋庸置疑的。元人祝尧就曾明确地说：“然骚者，《诗》之变也。《诗》无楚风，楚乃有骚，何邪？愚按，屈原为骚时，江汉皆楚地，盖自文王之化行乎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已列于‘二南’，十五国风之先。其民被先王之泽也深。风雅既变，而楚狂‘风兮’之歌，沧浪孺子‘清兮浊兮’之歌，莫不发乎情，止乎礼义，而犹有诗人之六义，故动吾夫子之听。但其歌稍变于诗之本体，又以‘兮’为读，楚声萌蘖久矣。”^[5]正因为《楚辞》与“二南”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楚辞》在文本上同样深深地烙上了地域的印记。关于这一点，宋人黄伯思在《校定楚词序》中认为：“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

若些、只、羌、谗、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苹、蘼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6]黄伯思的这段话，明确地指出了《楚辞》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地域特征，而这种地域的特征实在就是对《诗经》十五国风地域特征的继承。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还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在距今 2300 余年前，中国诗人的创作就与地域有着自觉而又密切的关系，地域性特征已然成为他们诗歌作品中的重要元素或标志。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诗歌在进入诗人个体创作之初始，就与地域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楚辞》的诞生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古代诗人与地域的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就如同文化基因或文明密码，牢牢地附着在诗人的灵魂中，并形成了诗歌创作传统。这种传统绵延数千年，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诗人的创作。中国的古代诗人，一路行走，一路创作，他们的作品既留下了诗人行走的足迹，同时又在他们的作品中，深深地刻下了山河江湖、城市乡村的印记。像这类事例在中国历代诗人的作品

中真可谓俯拾皆是，举不胜举。仅仅从一些诗人诗作的题目，便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如：谢灵运《入彭蠡湖口》、李白《望庐山瀑布》、苏轼《初入庐山三首》、陆游《游山西村》、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等，这些自然景观经过诗人生花妙笔，便成了魅力无穷的文学景观。再如，王勃《滕王阁》、王之涣《登鹳雀楼》、崔颢《黄鹤楼》、欧阳修《寄题沙溪宝锡院》、苏轼《题西林壁》、黄庭坚《登快阁》等作品，原本这些人文景观或许很普通，但是，经过诗人的艺术加工后，这些看似普通的人文景观，便增添了一层引人入胜的艺术感染力，从而使这些人文景观，演变成为著名的伫立在城乡山林之间的诗意浓郁的文学地标，虽然历经数千年，这些地标建筑多有损毁，但是，对于这些地标建筑，历代都极为重视，往往是屡毁屡建，从而使这些地标建筑永远存续在广袤的大地上，同时也永远伫立在人们的心间。

二

我们说，《诗经》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地域视角，是因为《诗经》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因此，早在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在解读或评论《诗经》时，特别是在解读或评论国风时，很自然地就会将目光聚焦在地域上，换言之，以地域的视角来阐释《诗经》，这已是先秦、两汉评论家们所采用的重要批评方法之一。也正是从他们的《诗经》批评开始，地域视角便成了后代文学批评家们代代相承的文学评论传统。

在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便是吴公子季扎，他在对《诗经》十五国风解读时，地域意识就显得十分明显，《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曾经记录了吴公子季扎的这段著名评论：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7]

季扎曾接受过六艺等的严格训练，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所以听完一曲演奏，他便能立刻说出作品中的意蕴和地域特点。当然，季扎这段话的意义还不仅仅在这一个方面，更有价值的是，他这段话是第一次以地域视角对《诗经》（其实也可扩展为文学）进行系统的评论，这段评论实际上就是《诗经》地理学（亦即中国文学地理）之先声。吴公子季扎评《诗经》的年代，距离《诗经》成集的年代并不遥远，因此，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认为，以地理视阈来关照文学作品，是伴随着中国第一诗歌总集《诗经》的诞生而产生的。

季扎的这段著名评论，在《诗经》研究和古代文学批评领域至少还有这样两个重要影响：一是对后代文学评论的影响，可以这样认为，后代文学批评中的地域关照，或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这一评论的影响，因而使文学批评的地域观照得以延续和拓展；二是在季扎之后的《诗经》研究中，地域的观照尤为显著，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传统，即《诗经》地理学的构建和确立，且在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其基本框架已经构建形成，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古代文论特色的《诗经》地理学。

以地理视阈来关照文学作品，当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源头之一。而且，肇始于春秋之际的这一源头，在其后的发展中仍是绵延不断，一直浸润着中国文学批评这块沃土。这里首先应该提到一位重要“接棒者”，他就是班固。他那不朽的历史巨著《汉书》，除了其史学价值外，还具备多学科的多种价值，如开拓《诗经》地理批评就是其中之一。在《汉书·地理志》中，班固将地理视阈作为文学批评的切入角度，对《诗经》等文学作品作了较为系统的地理分析。因而《汉书·地理志》成为吴公子季扎之后，以地理视角来关注《诗经》的代表性著述。《汉书·地理志》延续、固定并光大了以地理视角来关照和批评《诗经》的传统。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以《诗经》作品中所反映的地理信息，对古今地名进行考辨，赋予《诗经》以一种新的功能。在《汉书·地理志》中，班固曾称：“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

《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8]在班固看来，要考辨古今地名变化，《诗经》是重要文献之一。于是，在《汉书·地理志》中，引用《诗经》作品来解释古今地名的现象极多。如，在释“郁夷”时，班固说：“郁夷，《诗》‘周道郁夷’。有汧水祠。莽曰郁平。”²在释“雍州川”时，他是这样说的：“芮水出西北，东入泾，《诗》芮鞠，雍州川也。”再如，释河北：“河北，《诗》魏国，晋献公灭之，以封大夫毕万，曾孙絳徙安邑也。”^[8]释魏国：“魏国，亦姬姓也。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诗曰‘彼汾一曲’、‘寘诸河之侧’。”³班固使用这种引证方法，极其自然地将《诗经》中的地理因素凸显出来，而且使作品与地理变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这部诗集“覆盖”上一层浓郁的地理色彩。

第二，从区域历史变迁的角度，来解读作品。如对《诗经》中的《豳风》《秦风》，他是这样评说的：“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豳，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再如，对河内所发生的变化，班固从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在《诗经》作品中获得历史依据而加以说明，其云：“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洛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邶诗》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9]类似这样的征引，在《汉书·地理志》极多，诸如“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它人是偷’；‘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吴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魏国，亦姬姓也，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诗曰‘彼汾一曲’，‘寘诸河之侧’。”^[9]如此等等，凸显了以史解诗、以诗证史和以诗考地的特点。

第三，以地域风俗民情来解读作品。如对《陈风》的分析：“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又曰：‘东门之粉，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吴札闻陈之歌，曰：‘国亡主，其能久？’自胡公后二十三世，为楚所灭。陈虽属楚，于天文自若其故。”又如：“郑桓公寄孥于虢、郕，郕受之。后三年，幽王败，桓公死，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郕之地，右洛左济，食溱、洧焉。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濯濯兮，士与女，方秉兰兮，洵于且乐，伊其相谑。’此其风也。”吴札闻郑之歌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后二十三世，为韩所灭。”^[9]在以风俗民情解读相关作品时，班固对风俗民情的形成原因，也作了历史的分析和判断。

第四，以对不同地域的作品分析，来反映道德教化在相关地域的作用。如对《唐风》《魏风》的分析：“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它人是偷’；‘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吴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魏国亦姬姓也，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诗曰：‘彼汾一曲。’自唐叔十六世至献公，灭魏以封大夫毕万，灭耿以封大夫赵夙，及大夫韩武子，食采于韩原，晋于是始大。至于文公，伯诸侯，尊周室，始有河内之土。吴札闻《魏》之歌曰：‘美哉汾乎！以德辅此，则明主也。’文公后十六世，为韩、魏、赵所灭，三家皆自立为诸侯，是为三晋。”^[9]以一个地域的道德教化来解读作品，而又以一个地域的作品来印证道德教化在一个地域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也是班固解读《诗经》的独到之处。

当然，笔者强调《汉书·地理志》在《诗经》研究中的方法论作用，并不是要否定在班固之前即有以地域视角关注文学作品的实践，如，关于楚国的兴衰，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人将其艺术与楚地鲜明特征的“巫”相关联，《吕氏春秋》曾言：“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侈则侈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生必伤。”^[10]汉代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

在论述《楚辞》时，他们也将《楚辞》中的作品纳入地理视阈之内加以考察，虽然，对《楚辞》中作品的地域性评论，没有像对《诗经》评论那样系统全面，但是，对于楚地、对于《楚辞》的研究，汉代学者的地理意识也是比较明显的。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曾对楚越之地的特征作过这样的描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蚑蠃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11]班固也在《汉书·地理志》中也这样说过：“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蚑蠃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9]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以地理视阈关注文学作品，实为那时学者的共同意识，并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汉代学者以班固为代表的关于《诗经》的评论，以王逸为代表的关于《楚辞》的评论，都能以地理视阈对所研究的作品加以关照，而且，他们已然将作品与地域风俗、历史沿革、道德教化等相互结合进行考察和佐证，这种对《诗经》《楚辞》的评论方式，实与当下之文学地理学所倡导的批评要素相契合。

三

文学地理批评方法，早在两汉时期的《诗经》《楚辞》研究中就得以运用，而且这种方法的运用以及观念的形成，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其后的文学家和评论家，如在古代作家字号的选取及称谓上以及评论家对文学流派的命名等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中国古代诗人与地域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饶有趣味的现象，这就是在中国古代诗人的字号中，不少都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形式：

一是不少诗人以自己的故乡或祖籍地为号。如唐代的贺知章，他是会稽永兴（今属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故自号“四明狂客”，而四明山就在其家乡附近。由此生发开来，人们也习惯以某些诗人的祖籍地或籍贯地来称呼这些诗人，如，唐代韩愈，常以“昌黎韩愈”自称，昌黎位于今河北省，为韩愈的祖籍地，故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柳宗元，系河东（今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亦以“河东柳宗元”自称，古世人称之为“柳河东”“河东先生”；北宋时期的欧阳修是庐陵永丰人，他常常自署“庐陵欧阳修”，故后人称之为“庐陵先生”；曾巩是江西南丰人，世称“曾南丰”“南丰先生”；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世称“王临川”“临川先生”。

二是以独特建筑为号。像别墅、庄园、斋名等为号，如南宋范成大，他曾在家乡苏州建有石湖别墅，其额为宋孝宗所赐：“公之别墅曰‘石湖’，山水之胜，东南绝境也。寿皇尝为书两大字以揭之，故号‘石湖居士’云。”^[12]南宋杨万里，号诚斋，其号来历为：“杨万里……为赣州司户调永州零陵丞时，张浚谪永，杜门谢客，万里三往不得见，以书力请始见之。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光宗尝为书‘诚斋’二字，学者称‘诚斋先生’。”^[13]

三是以仕宦地为号。如，唐代柳宗元曾任柳州刺史，世称“柳柳州”，“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时……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世号柳柳州。”^[14]北宋苏轼，曾为黄州团练副史，在黄州其间，“公幅巾芒屨，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15]总之，地域特征已成为中国古代诗人的一个显著标识。

汉代学者以地理视阈关注文学作品的这种批评实践，对于后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这里我们仅举两类事例，便能说明以地理视阈关注文学的这种批评实践，在古代文学批评家中运用得是多么的广泛。

其一，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形成过不少的文学流派，在对这些流派命名时，地域特色是其中常见的方式之一，可以说，以地域命名文学流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如形成于北宋时期的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就是以地名命名的一个极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中是这样说的：

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

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錡、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邁、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觐、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16]

从以上这段引文中，可以感受到批评家的鲜明的地域意识：首先，诗派命名的地域意识，陈后山、韩子苍、潘耒、夏均父、林敏修、林敏功、晁叔用、江子之、祖可、高勉等人，虽非江西诗人，但因与黄庭坚诗风接近等原因，故而亦列入派中。其次，对诗人称呼中的地域意识，如称黄庭坚，文中均以“豫章”“山谷”称之，“豫章”之称，当为学者因黄庭坚为江西（江西又称“豫章”）人，故人们尊称其为“豫章先生”“豫章”⁴而“山谷”⁵为黄庭坚自号，后人便以其号称之。再次，介绍诗人时的地域意识，在刘克庄“总序”中，对非江西籍人士，刘克庄也都一一道出了这些诗人的籍贯地，当然，这也是想说明列入江西诗派中的诗人并非全是江西人。

古代文学批评家们这种鲜明的地域意识，还反映在为其他文学流派命名方面，在给文学流派命名时，地域同样是重要选项之一。与“江西诗派”的命名相同，在为中国古代文学其他流派命名时，其代表作家的籍贯地往往就是该流派命名的重要依据。如，南北产时期的“竟陵八友”，指的是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8人：“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帝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17]明代后期曾出现过一文学流派——“公安派”（又称“公安三袁”），其代表人物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系湖北公安人，故以“公安”名流派。清人永在评介《袁中郎集》是，有这样一评论：“明袁宏道……其诗文所谓‘公安派’也。盖明自三杨倡台阁之体，递相摹仿，日就庸肤。李梦阳、何景明起而变之，李攀龙、王世贞继而和之，前后七子遂以仿汉摹唐，转移一代之风气。迨其末流，渐成伪体，涂泽字句，钩棘篇章，万喙一音，陈因生厌，于是‘公安三袁’又乘其弊而排抵之。”^[18]再如，清代著名散文流派“桐城派”，其领袖人物为安徽桐城人，评家曰：“《曾文正公文钞·欧阳生文集序》云：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刘君大魁，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19]“今之为文者，动曰有派，蒙窃惑焉。夫所谓派者，不在周、秦、两汉、唐、宋之文也，吾皖有‘桐城派’，吴中有‘常州派’，近则‘常州’衰而‘桐城’盛，天下宗之莫敢异议。桐城之文，固皆取法于周、秦、两汉、唐、宋，而严其体例，区其门径，兢兢焉恪守古人法度绳尺者。‘桐城’之文非不可学，学‘桐城’者入于窠臼，而罕能振拔也。”^[20]他如“茶陵诗派”“竟陵派”“浙西词派”“阳羡词派”“常州词派”等流派，莫不以地名名之。

其二，文学批评家们将目光聚焦在某一地域的文学现象上，这一评论实践，更是直接继承了先秦批评家评论《诗经》的传统，因而在对地域文学现象进行述评和归纳时，这些评论家的论述更具地域色彩。如宋人黄彦平在《王介甫文集序》中，对宋代江西的文学现象作过这样的评述：“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王元之、杨大年笃尚音律，而元献晏公臻其妙，柳仲涂、穆伯长倡古文，而文忠欧阳公集其成，南丰曾子固、豫章黄鲁直，亦所谓编之乎诗书之册而无愧者也。丞相早登文忠之门，晚跻元献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鲁直称为不朽。”^[21]宋人陈贵谊、李道传在《谥文节公议》中云：“窃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词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22]清代江西临川人李紱曾对江西文学的发展作过这样一个精辟的概述，其云：

粤自东汉，论者李朝，黎阳九歌，风雅启苗。晋推靖节，上接《离骚》，寻阳隐逸，莲社贤豪；名章伟构，水深山高，散落人间，泰山毫毛。洎乎有唐，以诗取士。时则刘慎虚擅开元之奇，吉中孚拔大历之萃。任涛、郑谷，称十哲于咸通；卢肇、黄颇斗两龙于秀水。南康綦毋，鄱阳颖士；来氏兄弟，丰城季子。或矜《西山》之编，或侈《灵溪》之制。莫不驰誉寰区，蜚声域外。至于文律恢奇硕大，吴武陵则西汉可以兴，幸南容在枚马之次。媲柳配韩，角张竞李，犹未足尽江南之能事也。宋兴百年，文章陋窳，欧阳公奋兴，然后沛然复古，并轡绝驰，直追韩愈，探大道之根原，作斯文之宗主。独立一代，高视六寓，不特吴越所绝无，盖寰瀛所希也。若夫晏临川开荆国文公，李旼江传南丰子固，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士居其五。黄涪翁辟宗派于西江，周益公领台阁乎南渡……^[23]

其实，类似这样的地域性文学批评，在中国古代文学评论发展进程中可谓屡见不鲜，如，清代的陈寿祺在《闽词钞序》中谈及地方词选编辑时，也谈及福建文学发展特色，他云：“词选昉于后蜀赵崇祚之《花间集》，厥后《花庵》《草堂》踵事日增。然或取唐末名家，或取宋末遗民，或辑南宋，或采掇唐宋间及元人，未有专摭乡邦之作勒为一编者，有之惟本朝《浙西六家词》，它未再见也。闽中自宋柳耆卿以歌词名，缠绵旖旎，善言情世，与清真居士并推，至使西夏人重之，谓凡有井水处能歌，可谓盛矣。其外如蔡伸道《友古词》、黄思宪《知稼翁集》、张仲宗《芦川词》、赵用甫《虚斋乐府》、刘潜夫《后邨别调》、葛紫清《海璠集》，皆卓然名家，侔之苏、黄、晁、秦何多让焉。而陈忠肃、李忠定、朱文公真文忠以千载儒宗硕辅，靡不从事诗余，清新婉丽，各臻其胜……近日吾乡词学失传，两宋词家学者，或莫能举其名是可慨也。叶小庚太守善为诗，兼工倚声，尝编《词谱》及《词韵》六卷，为词家之圭臬，复辑《闽词钞》五卷，始于宋徐昌图，终于元洪希文，附以方外闺媛凡五十余家，为词逾千首，以存桑梓词人之梗概。”^[24]再如，清人何绍基在评及安徽文学特色和“桐城派”影响时，他是这样说的：“安徽跨皖江南北，称人文渊薮。皖人承紫阳之绪，多为理学，为经学其次。乃称文章，曹植、张籍，汉唐文章之派既在皖北，至我国朝方苞、刘大櫟、姚鼐递授文法，学者多归向之，号桐城派。传之江南，昌之江西，流衍于广西，渐渍于湖北、湖南、山西、贵州，而桐城文派，几徧于天下。其说谓义理、词章、考据，三者不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词有所附，考据有所归，近世学子盖承用此说，至讽咏篇章，语多温厚，无纤靡之习，又其质性然也。”^[25]更有文学家看到了地域对人的影响，唐代刘禹锡曾有《海阳湖别浩初师》诗一首，其“诗引”部分，尽言潇湘之地对人的影响，其云：

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长沙人浩初生，既因地而清矣，故去葦洗虑，剔颠毛而坏其衣，居一都之殷，易与士会，得执外教，尽捐苛礼。自公侯守相，必赐其清问，耳目灌注，习浮于性，而里中儿贤适与浩初比者，婴冠带，蒙妻子，吏得以乘凌之。汨没天慧，不得自奋，莫可望浩初之清光于侯门上坐，第自吟羨而已。浩初益自多其术，尤勇于近达者而归之。^[26]

类似以上的论述，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应该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由此也可看出，对文学作品的地域关照，从季扎始，经过后世文学批评家们的代代传承，已然成为历代文学批评家们考察文学作品时必不可少的重要视点之一。

参考文献:

- [1] (汉)郑玄. 仪礼疏: 卷 9[M]. 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 [2] (汉)班固. 汉书: 卷 30[M].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 [3] (汉)毛亨. 毛诗注疏: 卷 1[M]. 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 [4] (宋)朱熹. 诗集传: 卷 1[M]. 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
- [5] (元)祝尧. 古赋辨体: 卷 1 (楚辞体上) [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 [6] (宋)黄伯思. 东观余论: 卷下[M]. 宋刻本.
- [7] (晋)杜预. 春秋左传正义: 卷 39[M]. 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 [8] (汉)班固. 汉书: 卷 28 (上) [M].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 [9] (汉)班固. 汉书: 卷 28 (下) [M].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0] (秦)吕不韦. 吕氏春秋: 第 5 卷(仲夏纪) [M]. 四部丛刊景明刊本.

[11] (汉)司马迁. 史记: 卷 129 [M].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2] (宋)杨万里. 诚斋集: 卷 82 [M]. 四部丛刊景宋写本.

[13] (元)脱脱. 宋史: 卷 433 (列传) [M].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4] (宋)欧阳修. 新唐书: 卷 168 (列传) [M].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5] (宋)苏辙. 栞城后集: 卷 22 [M]. 四部丛刊景明嘉靖蜀藩活字本.

[16] (宋)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卷 48 [M]. 清乾隆刻本.

[17] (唐)李延寿. 南史·梁本纪(上): 卷 6 [M].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8] (清)永 2). 四库全书总目: 卷 179, 集部 32 [M].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9] (清)陈康祺. 郎潜纪闻二笔: 卷 10 [M]. 清光绪刻本.

[20] (清)方浚颐. 二知轩文存: 卷 1 (文论) [M]. 清光绪四年刻本.

[21] (宋)黄彦平. 三余集: 卷 4 [M]. 民国宋人集本.

[22] (宋)杨万里. 诚斋集: 卷 133 [M]. 四部丛刊景宋写本.

[23] (清)李紘. 南园答问 [A]. 吴海, 曾子鲁. 江西文学史·导言 [C].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5.

[24] (清)陈寿祺. 左海文集: 卷 6 [M]. 清刻本.

[25] (清)何绍基. 重修安徽通志(光绪): 卷 222 (人物志·文苑一) [M]. 清光绪四年刻本.

[26] (唐)刘禹锡. 刘梦得文集: 卷 7 [M]. 四部丛刊景宋本.

注释:

1 近时考古发现的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记有这段话, 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2 对“周道郁夷”句, 颜师古曾有解释说: “《小雅·四牡》之诗曰: ‘四牡騤騤, 周道倬迟。’ 韩诗作‘郁夷’字。”

3 文中所引“彼汾一曲”出自《诗经·魏风·汾沮洳》; “寘诸河之侧”出自《诗经·魏风·伐檀》。

4 此称呼在宋代文献中多有记载, 大概出自宋无名氏之《豫章先生传》, 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 8 (清乾隆刻本) 记

云：“苕溪渔隐曰：《豫章先生传》载在《豫章外集》后，不知何人所作，初无姓名，其传赞叙诗之源流，颇有条理……”

5 宋·黄宙田焱《山谷年谱》卷 11（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山谷寺，在皖山三祖山，属舒州，有石牛洞等林泉之胜，先生游而乐之，因此‘山谷道人’。”